

台灣原住民文學研究概述

劉智濬

一、前言

《台灣文學年鑑》首度將原住民文學研究獨立成篇，標誌此一範疇已然成為台灣文學研究質量兼具的專區，有其高度象徵意義；誠如卑南族學者孫大川所言：「原住民文學當然是整個台灣文學中最重要且具根源性意義的資產」、「經過將近20年的發展，原住民文學雖不能說已成為巨江大河，但卓然自立、已形成自己獨特的性格與生命，卻是不爭的事實。」¹展望未來，原住民文學研究必將成為台灣文學研究中愈見重要的論述領域。

回顧台灣原住民文學研究，1980年代末期，漢人吳錦發為布農族作家田雅各小說集《最後的獵人》（台中：晨星出版社，1987）所作序文，以及將原住民文學與1980年代台灣社會運動脈絡連結的詮釋，可以視為濫觴。1990年代初始，台灣文學史建構者之一的漢人作家葉石濤對「原住民文學」作出定義，認為：原住民文學「皆包括在台灣文學裡面」、「是台灣文學裡面最具特異性的文學」、「是原住民提高其族群地位、抗爭手段的一部份。」然而與此同時，孫大川在討論「原住民文學的可能」時則指出：思考台

灣後殖民或所謂「本土化」問題時，若不將原住民考慮進去，將使反省停留在意識形態、歷史解釋權之爭，無法深入問題本質；因為對原住民而言，「殖民／被殖民」的政治、歷史模式，除了日本「異族」統治外，漢人無論先來後到，其實一直扮演殖民者角色。可以說，從漢人葉石濤與卑南族孫大川開始，原住民文學研究就無可避免地從「台灣文學／原住民文學」這種最基本、同時也最棘手的關於範疇、質性、主體、從屬、國族、原漢關係等議題展開；從時代背景來看，這也是對後戒嚴時期歷史條件之下國族認同解構／重構需求的回應。

如若以孫大川主編的2冊《台灣原住民族漢語文學選集·評論卷》（台北：印刻出版公司，2003）為觀察範疇，1990年代原住民文學研究主要集中於：文化復振、歷史分期、主體建構、現代性反思、去／後殖民、國族認同、語言策略、原漢關係等呼應1990年代後戒嚴時期氛圍的議題；同時，透過對莫那能、田雅各、瓦歷斯·諾幹、夏曼·藍波安、奧威尼·卡露斯盎、利格拉樂·鱒等原住民作家及其代表著作與文學生命歷程的分析，逐步進行當代原住民文學經典形構（canon formation）工程。這些論述不僅為後來的研究立下議題規範——或許也是限制，也成為後繼者一再引述申論的前行研究；尤

1 孫大川，〈主編的話〉，《台灣文學研究學報》6期（2008.04）。

其2000年之後逐漸增加、以原住民文學為研究對象的學位論文，基本上大多在這些前行研究所設定的議題框架之下進行更細膩的演繹，從而形成學院體制內文化資本的累積與再生產。值得注意的是，這些以文學文本為研究對象的學位論文，不僅跨越台文、中文疆界，還包括外文、教育、民族等系所，說明原住民文學研究除了方法論上的多元，也跨越既有學科系所的領域。²按照傅柯後結構語言學（考古學、系譜學）的觀點，論述（discourse）總是與知識／權力（power／knowledge）關係密切，各種論述的演進，即是話語型構（discursive formation）、權力支配系統不斷轉換的過程，所有論述都涉及知識生產與權力運作，而這也展演在前述1990年代原住民文學研究主要議題的探索過程中。

2 2000年以來學位論文，如以主題分類，大約可分成（1）以認同與主體建構為題者，如陳秋萍，〈原住民文學中的自我認同與主體重建〉（靜宜大學中文所碩論，2002）、董恕明，〈邊緣主體的建構——台灣當代原住民文學研究〉（東海大學中文所博論，2003）；（2）以作家專論為題者，如蔣美華，〈後殖民的部落空間——析論瓦歷斯·諾幹「台灣當代原住民文學」的主體建構〉（彰化師範大學國文所碩論，2003）、謝惠君，〈魯凱族作家奧威尼·卡羅斯盎之研究〉（屏東師範學院教育行政所碩論，2005）等；（3）以環境哲學、語言策略等特定議題為題者，如洪浩仁，〈經由故事敘述傳遞環境哲學：以喬瑟夫·布魯夏克與亞榮隆·撒可努的原住民文學作品為例〉（靜宜大學英語所碩論，2005）；陳芷凡，〈語言與文化翻譯的辯證——以原住民作家夏曼·藍波安、奧威尼·卡羅斯盎、阿道·巴辣夫為例〉（清華大學台文所碩論，2006）等；以及論述範圍最廣的魏貽君〈戰後台灣原住民族的文學形成研究〉（成功大學台文所博論，2007）。

二、概述

（一）史觀與原漢關係

1. 巴蘇亞·博伊哲努（浦忠成），〈台灣原住民族運動與文學的啟蒙〉，《台灣原住民族研究季刊》1卷1期（春季號），頁39-58。

本文認為，當前關於原住民文學的討論，多半針對出版作品進行，從而忽略了1980年代初期結合正名、還我土地、反雛妓等議題之原住民運動人士的文字書寫。事實上這一批原住民知識分子是率先看清民族處境與外在惡質環境的先覺者，包括胡德夫、夷將·拔路兒等人在內，不以文學為職志，寧願走上街頭表達原住民憤怒的原運人士，在政治氣氛冷肅的年代，將文字發表於《山外山》、《高山青》等受到黨政當局監控、沒收、阻撓的原住民族運動刊物；其書寫行動，不僅對後來的原住民社會發展影響深遠，也是原住民族運動衝撞戒嚴保守勢力的強大武器。本文強調，這些文字論述充滿如刀劍彈藥般的力量，表達原住民族數百年來遭受壓迫與歧視的心聲，是原住民族文學最珍貴的特質，吾人應該重新省思其文學價值與地位。

巴蘇亞·博伊哲努此一觀點，回應了前引漢人吳錦發1989年的詮釋，將原運時期的原住民書寫文字重新納入「文學」觀察範疇，除了使其再次歷史化、脈絡化，更重要的是提醒吾人，建構台灣原住民文學史時，不應忽視原運時期原住民書寫文字對日後原住民文學的啟蒙價值。

2.孫大川，〈從生番到熟漢——番語漢化與漢語番化的文學考察〉，《台灣原住民族研究季刊》1卷4期（冬季號），頁175-196。³

本文試圖從原住民角度思考：如何超越過往國家／父系權力語言宰制，使台灣複雜多元的語言不但不是負債，反而成為想像活力和文化創造資產。作者以為出路在於將過去習慣的單線演化思維（從「番」到「漢」）做一個迴向，循著找回媽媽的路，從「漢人」回溯「熟番」、「土番」、「野番」（生番），透過如此往復反省，才能超越漢族圖騰，擺脫漢族中心主義，從而誕生一個具有敞開性的新台灣人意識。

作者以1990年代「折返」的平埔意識為例，提醒吾人族群邊界／自我主體／族裔本質的浮動性，並且透過從「生漢」而「化漢」、「熟漢」（清楚認識並欣然接受來自父母雙方文化基因的人）的相反路徑，突顯漢人願意「返來做番」的意識轉折。如從語言的角度來看，則漢語必須向「番」語開放，並從其間生長出具有台灣特色的新漢語。作者以為，要達到這樣的語言解放，必須仰賴原住民和漢人的合作與努力，也就是「番語漢化」和「漢語番化」的共同實踐，而阿美族阿道·巴辣夫的「肛門」（government）與漢人傅大

為的「百朗文化」等詞彙，則是「漢語番化」與「番語漢化」的具體實踐。

文末，孫大川饒有深意的指出，此種具有高度語言挑戰、非純化漢語文本往往帶給閱讀者陌生感和排斥性，很難獲得傳統報章雜誌、出版機構的支持，這也說明了目前被主流社會普遍接受的原住民作家，何以總是集中在少數幾位的原因。最後，孫大川強調，「漢語」向「番語」的迴向，將是文學語言自然又充滿驚喜的酬答與唱和。

作為台灣原住民文學史觀、理論重要奠基者之一的孫大川，在此文中，從原住民立場重新處理了1990年代以降最具爭議性的「台灣主體性」議題，透過「熟漢」概念，提供一個新的、敞開性的台灣人意識的思考空間；此一論述，實乃孫大川1993年借用維根斯坦「家族相似」理論，提出在台灣主體性建構原則之下進行對話之「你我關係」論點的延續與深化。

巴蘇亞·博伊哲努、孫大川兩位原住民學者的論述，再次說明原住民文學書寫的社會實踐功能，即使從文學性、語言運用入手，依然必須回歸身分認同與主體建構的脈絡，始能掌握其核心價值與意義。

（二）個別作家專論

- 1.楊政源，〈試論《冷海情深》（1992-1997）時期夏曼·藍波安的文化策略〉，《東吳中文學報》16期（11月），頁181-200。
- 2.許雅筑〈傳統與現代——原住民作家夏曼·藍波安的地誌書寫與對話〉，《台灣文學學報》6期（4月），頁103-126。

3 本文最早發表於2006年「返本鑄新——第1屆台東大學華語文學學術研討會」，其後，長期刊登於「台灣文學部落格」：http://140.119.61.161/blog/forum_detail.php?id=563。

3.伍寒榆，〈記憶生態原鄉——亞榮隆·撒可努的獵人書寫〉，《台灣文學評論》8卷1期（1月），頁102-119。

楊政源以夏曼·藍波安返鄉初期10年的《冷海情深》為例，探討台灣原住民族領導菁英在意圖重建傳統民族文化之際，如何呼應纏夾了西化與漢化的現代性需求。作者引用廖咸浩論述，說明原住民知識菁英在現代與傳統之間難以拿捏分寸的困境；同時透過陳建忠觀點，指出夏曼·藍波安「人／我」、「漢／原」、「台灣／蘭嶼」、「冷漠／友善」、「惡／好」、「批評／讚許」的二分法書寫策略，存在著將達悟族的未來走向窄化、一元化的危機。作者以為，此一階段的夏曼·藍波安，無論生活實踐與文學書寫，都游移於傳統、現代兩端之間，並未找到調和點。⁴

許雅筑以「全球與本土並非對立，而是一種互動狀態」的觀點指出，作為返鄉知識分子的夏曼·藍波安，透過祭典參與、歷史追溯、勞動生活體驗以及神話傳說採錄與再創作，在建構原住民族文化空間的同時與文化傳統銜接、交談，這是一種辯證的、既「返本」又「開新」的實踐歷程。作者認為，夏曼·藍波安的書寫並非全然排斥現代文明，亦非固著地方、強調異質，而是透過吸納沉澱，

給出一種混雜（hybridity）與在地增能（empowerment）。

以上2篇皆以夏曼·藍波安為討論對象，雖然前者以特定時期文本為範疇，然亦清楚呈現兩文對相同議題的詮釋差異。從某個角度來看，所謂「游移」與「混雜」，實為一體兩面，端視論者切入視角與引用理論而定；較之早期關曉榮、陳其南正向與推崇的評論，這2篇論文看見的，其實是一個回歸傳統之路走得不是那麼篤定的夏曼·藍波安；然而，與其說夏曼·藍波安被以不同方式重新審視，不如說漢人也在調整他們所需要的「他者」圖像。

伍寒榆的〈記憶生態原鄉——亞榮隆·撒可努的獵人書寫〉認為，亞榮隆·撒可努《山豬、飛鼠、撒可努》、《走風的人》中的獵人形象，乃是民族生態學導師、族群生態知識建構者，此一以生態視角向部落學習的獵人形象，與拓拔斯·塔瑪匹瑪筆下困挫於傳統與現代之間的獵人相較，開啟了當代原住民文學發展的可能性——衝突與矛盾的音調，趨為和緩的自然交響樂章，悲情獵人轉為民族生態人。然而，值得吾人思考的是，亞榮隆·撒可努之所以轉向，除了歸諸原住民作家本身對傳統文化視角的調整，是否也應該將主流社會的期待視野（一個符合漢人需要的新的「他者」圖像）納入考慮？當亞榮隆·撒可努的作品被選入中學國文教材時，是否與當代所謂尊重生態的知識建構需求有著密切關聯？畢竟對「百朗」來說，一闕「和緩自然交響樂章」，比起將「政府」（government）喻為「肛門」的詩作，是要安全又舒服許多的；但也因為

4 楊政源於本文結束前強調，《冷海情深》之後5年出版的《海浪的記憶》對傳統／現代的看法與策略已有更易，同時也以他文處理，惟其屬於研討會初稿，暫不討論。

舒服，所以便讓我們的孩子忘了社會中依然持續的族群壓迫！

（三）非原住民／漢人的原住民書寫／研究

1. 陳芷凡，〈從東番到Formosa——試探〈東番記〉、〈福爾摩沙報告〉中的性別書寫〉，《台灣文學研究學報》6期（4月），頁75-101。
2. 劉智濬，〈當王德威遇上原住民——試論王德威後遺民論述〉，《台灣文學研究學報》6期（4月），頁157-191。

陳芷凡以明朝遊宦文人陳第1603年的〈東番記〉與荷蘭東印度公司牧師Candidius 1628年的〈福爾摩沙報告〉（Discourse）為對象，從「性別」視角探討17世紀前期中國人與歐洲人對台灣土著風俗文化的再現差異；陳芷凡認為，此一差異與作者的文化背景、書寫意圖有關，同時投射了作者所屬社會的知識／文化系譜。

劉智濬則以王德威2000年以來包括〈拾骨者舞鶴〉、〈後遺民寫作〉、《台灣：從文學看歷史》等論述為範疇，耙梳王德威透過重探遺民意識進而與「台灣意識」、「本土論述」對話的意圖；劉智濬認為，王德威的後遺民論述係以防衛兼之敵意的姿態面對「台灣意識」與「本土論述」，當其一心凝視中國原鄉之際，實則忽略了包括原住民族在內的諸多台灣歷史脈絡，這也導致王德威在詮釋原住民議題與作品時所展現的中國／漢人觀點，成為後遺民論述的缺陷與盲點所在。

嚴格說來，這2篇論文並非原住民文

學研究，而是書寫原住民／研究原住民文學的研究，此一範疇的前行論述頗豐（對象從明清遊宦文人到1980年代以降的鍾肇政、葉石濤、王家祥等），⁵可以視為一個與原住民文學研究平行且交互含攝的外延場域，這個場域往往突顯了歷代非原住民／漢人在不同時空條件之下介入原住民書寫／研究的知識生產動機與權力支配關係。

三、小結

上述主題之外，值得留意的尚有以原住民神話傳說為研究對象之：劉惠萍的〈想像與真實——台灣原住民「弟兄始祖神話傳說」的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與劉育玲的〈南鄒族沙阿魯阿（Hla'alua）貝神祭起源傳說試探〉，⁶二者皆從神話傳說的歷史演變入手而突顯其當代意義。至於董恕明的〈我輩尋常：東台灣原住民作家漢語書寫初探〉⁷，則試圖以一種「非常不學術（專業）」的讀者身分，超越當前「本土化」、「多元文化」、「族群融合」、「異質發聲」等流行論述框架，在所謂的「原住民文學寫法／讀法」之外，提出她的「常識意見」，從而以尋常之眼重新看見那些原住民文學中最尋常、但往往不為理論視域所見的尋常生命書寫。董恕明以

5 也包括本年度發表的：楊傑銘，〈帝國的凝視——論清代遊宦文人作品中原住民形象的再現〉，《台灣文學評論》8卷3期（7月），頁84-107。

6 二文皆發表於《台灣文學研究學報》6期（4月），頁9-38、39-73。

7 同註6，頁129-156。

學術規格對學術行規的顛覆，其實是一種辯證式的弔詭，或許很多學院中人都想當個跳開理論框架的尋常讀者，但是沒有人真的像她一樣把這種想望寫成學術論文，畢竟在論文中宣稱不學術（專業）的閱讀姿態，還是需要一個學術（專業）的發言位置；此文真正的價值，應該在於提醒／自省原住民文學研究者，原住民文學作品不能只是特定理論操演的工具。